

中國藝術研究院 学术文库

“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

方李莉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

方李莉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 / 方李莉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029-3

I. ①文… II. ①方… III. ①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0854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

著 者 | 方李莉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365千字

版 次 |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029-3

定 价 |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芑芑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朱智润 韩 进

委 员 王训海 左克诚 余 玲 杨红卫
杨迎会 李 强 张国平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学术教育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序 言

这本集子收集的基本是笔者从2001年至今所写的一些有关文化自觉、人文资源及非遗保护方面的文章。其中有相当的论文是来自2001年至2008年间，笔者所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工作中所做的研究与思考，费孝通先生是这一课题的学术指导，笔者是这一课题的总负责人和首席专家，这一课题做了八年，课题组成员有180余人，是一个跨学科的大项目。课题是2001年开始的，2003年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于是课题在人文资源研究中又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这一视角。有关“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主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从1996年随费先生学习，经常有机会聆听费先生相关的教诲，在课题研究期间，也经常得到费先生的指导，因此，整个课题研究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的研究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也好，都是为“文化自觉”、为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现代社会服务的。因此，在课题研究的八年时间，笔者写了许多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围绕着文化自觉、人文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主题来思考的。

有关这一主题研究的缘起可以延伸到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了“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研究”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云集了世界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笔者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所以参与了那次会议的讨论。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学到了不少的人类学的知识，其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的发言引起了我

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文化的同质化和多元化是同时出现的，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始，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出国生活的移民们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创建新的生活，也就是本土文化的一种复兴。他们的变化是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继续学习西方，但一些已经失去了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正在恢复，如传统的庆典活动、传统的公众仪式、传统的亲属网络等”。“这种传统的恢复是创新的一种手段，世界文化的一体性和差异性同时发展的，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形成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非西方的人创造他们文化观的斗争已摧毁了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一体化和多样化、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他的这些观点笔者后来在他的《甜蜜的悲哀》一书中也读到。他的有些理论我是非常赞成的，他是当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类学家。但笔者认为，他所说的这些恢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因为，作为文化来讲，那些与人类生计有关的文化，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内核部分，而其他的则属于外围部分。如果内核已经改变了，它的外围部分还能存在吗？因此，我认为有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讨论，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或者还未完全开始。

而美国人类学家桑格瑞认为，过度地强调本土化就会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关门主义，甚至民族冲突乃至战争^①。笔者认为，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造成这种原因的，正是文化生态遭到了破坏的结果。因此要避免这种后果，首先就是要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历史、彼此之间的文化，而对个人来讲则要求尊重对方人格上的独立。在21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可能不再仅仅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心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将牵涉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我们要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人类早期的

^① [美] 桑格瑞：1998年4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那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在重返大自然的同时，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重建我们新的文化观念。

于是笔者撰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的论文，在论文中笔者写道：“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在现代化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传统地方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成批的这样的文化群都在消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在急剧地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递减。同时，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

论文思考的时间很长，从1998年开始，几易其稿，到2001年才最后完成。论文写完后，我交给费孝通先生，向他请教，虽然他并不完全赞成我以生物的例子来说明文化，但却认为该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基本的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并随即提笔推荐我向《北京大学学报》投稿。该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被许多报纸杂志及学者所引用。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我，问我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一旦消失，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对这些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我当时的回答是不确切的，因为觉得，自己当时的一些提法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不能凭空想象，而是要有大量的实例来说明。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为了保护西部的人文资源和文化生态，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向全国艺术科学办公室申报了国家

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并获得了批准。于是笔者回答记者说，我会用八年的时间和我们课题组的学者们一起来对西部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考察，最后通过实际认识来回答这一问题。

从2001年到2008年，笔者一路考察，足迹遍及西部各省，曾开车走过青藏高原，也曾到甘肃、青海的不同民族地区考察，还到过陕西的黄土高原以及云贵高原。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看到了自然生态的危机，也看到了农村正在日益萧条和日益现代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对象和环境正在消失，但同时，传统并未消失，它们正在成为人们建构新的文化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一方面破坏了传统，另一方面又似乎给了传统新的发展生机。所以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此时，笔者终于理解了费先生所提出的人文资源的概念。在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遗产承载的不再是远离我们的过去，而是成为与我们当今生活息息相关的和可供开发与利用的人文资源，成为我们重构新的文化的基础。其中所得出的理论分析和结论源自于课题所做的70多个个案研究之中。2008年课题结束后，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完成了“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共完成专著与考察报告12本（四百余万字），并完成了题为《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

这本论文集记载了自己做课题过程中的一些思考，通过这些论文能看到笔者这些年来心路历程的种种变化，也能看到许多观点是在不断修正中完善的。人类学的研究要求我们要长时间地观察某一个地方，所以在做课题的过程中，笔者虽然到过西部的许多地区，但做田野时前三年主要是集中在陕西省的陕北地区和关中地区。后三年主要是在贵州的梭嘎生态博物馆做苗族村寨的考察与研究。

本论文集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理论思考，主要是2001年到现在所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第二个部分：田野与个案，主要是从2001年至2008年我在西部所做的田野及个案研究，地域范围前面已经说过，主要是集中在陕西的陕北、关中以及贵州梭嘎的苗寨。第三个部分：学习与对话，主要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指导西部课题时所做的一些对话，还有几篇是笔者写的有关费孝通先

生“文化自觉”思想的研究文章，这些思想也是这么多年来笔者做学问的主要指导方针。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因此，“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一直在呼吁和在探讨的问题，就包括费先生当年让笔者去做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也有如此的含义。第四个部分“非遗”与“文化自觉”，这一部分是这么多年来笔者对“非遗”保护所做的一些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所写成的一些杂文。

实际上，无论是我们做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也好，还是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也好，都是为了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的目的在于掌握自己文化发展的命运。也就是像费先生所说的：“我们要研究我们文化中的种子，要研究怎样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保持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①“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②而我们所研究的“人文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种子，做这样的研究的过程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基因和种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但费先生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根据费先生的教导，我在西部做考察，不仅力求了解那些农民的文化传统，还在力求了解这些文化传统是在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费先生还说：“人类学要在观察人的生活实践中，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系统地去表达人们的人文世界，也就是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认识人的文化。

① 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内蒙古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② 同上。

所以笔者认为人类学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促进人的文化自觉。”^①“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②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记录和研究这些传统的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还要研究其存在的现状，以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目的是为了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2011年笔者曾有机会受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邀请到印尼巴厘岛开一个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研讨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27个国家，以往的国际会议总是以欧美学者为中心，但在那一次会议上，许多的学者都是来自第三世界、第四世界，有的国家非常小，甚至笔者从未听过其名字。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希望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些文化。在这里笔者很赞成萨林斯所说的，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对于传统的恢复“是创新的一种手段”。其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恢复，也是人类对自己文化发展方式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不亚于当年欧洲所产生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运动，它意义的深刻程度很可能还会超过当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文艺复兴只是发生在欧洲，而现在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一种共识。它最初是无声息的，就像雪花慢慢在飘洒，一点一点地在堆积，慢慢形成一个厚度，越来越厚，最后突然发生了雪崩，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了它的力量、它的存在。这就是物理学上的临界点，任何事物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将超出它最原初的出发点，它将是人类对自己文化的另一种认识的开始，这种认识将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通过八年来自己在西部考察的一些案例的研究和分析，笔者认识到，文化

① 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② 同上。

是一张有机联系的网络，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底层与上层之间、精英与民众之间，它们都不会是完全的割裂，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以外的文化。在这样的概念中，中国人类学家要认识的“异文化”应该有三种，一种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还有一种就是国内本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最后一种就是存在于民间的草根文化。我们只有从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中反观自己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文化的坐标。而笔者，通过研究西部民间的草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对人类的整体文化的构成有了一种新的、更完整的认识，对于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思想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这种理解和认识，都被笔者写到了自己的论文中，而这些论文都曾在不同的包括杂志上发表过。借中国艺术研究院结集出版学术文库之机，笔者将这些思考相近的论文编辑在一起，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读者们一起探讨这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笔者很难说自己的这本论文集有些什么独到的见解和思想，但里面提出的许多问题确实是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思考的，因为里面的许多思考来自于具体的社会事实、具体的实际存在。为了了解这一切，在西部考察的八年中我不断地进入田野，和田野中的农民、手艺人、秧歌队员、少数民族的群体等居住在一起，在那些地方笔者感受生活，也感受和自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人们的心灵跳动。在那样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和热情，还有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处处为我们的考察提供方便，借着出版的机会，笔者默默地在心里向他们表达着自己的谢意。

在这里笔者还要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为这次学术文库的编撰出版所做的一切努力。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编 理论与思考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 1

西部开发与高感情文化产业的发展 / 16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 / 24

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 / 39

谁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 / 63

新文化运动的崛起

—— 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 / 73

文化变迁的不同模式

—— 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考察所引发的思考 / 77

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

—— 以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为起点 / 104

中国文艺复兴中的冷思考 / 128

第二编 田野与个案

陕北人的窑洞生活

—— 历史的传承与变迁 / 145